

以文学为志业

黄平

金理

杨庆祥

——“80后学人”三人谈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YI WENXUE WEI ZHIYE

以文学为志业



——“80后学人”三人谈

杨庆祥 金理 黄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文学为志业: “80 后学人” 三人谈 / 杨庆祥, 金理,
黄平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95-7678-4

I. ①以… II. ①杨…②金…③黄… III. ①文学评
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65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20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文学批评三人行

张燕玲

与新世纪十年对文学批评此起彼伏的质疑不同，近年文学批评颇获赞誉，并显示出从内向外生长的新气象，其勃勃生机主要来自“70以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长成熟。其中时常被人提及的是“80后”杨庆祥、金理、黄平的三人行，三位青年才俊分别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不是同根生，却是同时长；虽各有师承，却相携同行。三人常常共同署名著文，或对话，或论述，或同会讨论，让我等老生疑似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人相重、文学批评多对“双打”的黄金时代。于是，在业内，“80后三人谈”便成为文学批评界一件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也许会日久弥深，眼前三人合集《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便不止于纪念和佳话了。

“以文学为志业”，不仅仅是明志，也是“三人谈”栏目首期话题，更是三人相生相应的底色和出发点。如果说在习博期间，庆祥与黄平就在导师人大程光炜教授带领下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八十年代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事件是同门同道的缘分；那么，2009年在常熟范小青研讨会上，庆祥与金理同居一室，两位作为《南方文坛》2008年第5、6期“今日批评家”的彻夜长谈并相约同

行，便是会心后的文学自觉了。他们既对自己的文学研究事业怀着天职般的虔敬，视之为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生活价值；更让人欣喜的是他们还富有平常心，他们不止一次与我谈到：高校青年教师生活清苦，要自己过好它，但能从事自己喜爱与理想的谋生职业已经是幸福了。关于职业与天职的关系，他们有着清醒的理性自觉。

最早见诸报刊的三人谈，是发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6、7期的《“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上下）——“我们时代的文学想像与文学生产”之一》。同年8月，在《南方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期间，我与三人达成共识：《南方文坛》2012年开辟三人谈专栏，三人轮流主持。第1期开栏词杨庆祥如是解说：

张燕玲老师找到金理、黄平和我，希望我们能以对话的形式在《南方文坛》开一个“80后学者三人谈”专栏，发表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一些意见，张老师的意思，年青学者，不能老做学生和听众，该发言了。至于我们想以“学人”自称，不敢戴“学者”之帽，张老师笑道：谦逊很好，但有“80后”做前缀啊，再说这既是肯定也是期待。经过仔细地商量，我们特别认同“80后”这个定语，首先当然是一种身份和代际的区隔，我们三人都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着这个“代际”特有的一些观念和经验并自然投射到我们的研究中；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种区隔同时也是一个将个体“历史化”的行为，个体只有把自己置于某一历史位置才更能理解自我和历史，因此，这种命名实际上是为后面的系列对话确定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思考的定点。

于是，三位“80后”学人的文学对话就从自我的阅读经验、文学趣味、知识型构谈起，追问在当下语境中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生蕴藉和担当使命。在此基础上，对话由近及远，分别论述了“新世纪历史写作”“八十年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传统”“未来文学备忘录”等系列话题。因为“80后”的特殊身份，他们还专门论述了“80后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种种话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80后”写作的历史和趋向。“三人谈”不追求统一的批评标准，相反，它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展示了一代人面对共同话题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立场。在这个思路里，对话在当下与过去、批评与历史研究、个体经验和普遍知识之间找到了一些交接点，打开了问题，并引起文坛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不同场合，我听到不少的赞誉。两年下来，“三人谈”被视作“80后”批评家登上文坛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见到安徽才子杨庆祥是2007年底，我们在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图书藏品厅举办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在满室高及屋顶的书卷中，还在读博士的庆祥谦逊平实，一副小鬼当家的模样。作为获奖者却反客为主，相助会务，一马当先，稳健干练，真是个勤恳可信赖的小伙子。要命的是，我从此六七年间便不断“剥削”庆祥，《南方文坛》活动会务、纪要、网络事物、栏目主持等，他总是爽快应答，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耗费了他不少智慧和时间。如今年代，如此尚德青年，难能可贵。

当然，他为文出色，曾获“娇子·未来大家”、《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等多种奖项。这首先得益于他导师光炜教父般的引导和关爱，光炜兄还把这种爱心传染给我，以至从2006年至今，《南方文坛》和我便不断得益于他们“重返八十年代”及近年“九十年代”的

系列研究，他的团队坚实地支持了我，其中庆祥和黄平便是突出者。庆祥的系列文章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作家、作品、期刊、思潮、事件包括“偶像”进行反思与追问，并举一反三，以此探究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学术体制（包括复杂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努力厘清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实现了他的批评的“去魅”功能。近年他更是活跃于文学现场，以有效的文学批评备受关注。我多次听到他在会上不畏权威的发言，独立内敛而不失锋芒，显示出了诗人的风骨。曾狂热写诗并获过“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的庆祥，会常常以诗人之心和诗歌之维写作与研讨，比如他获得过“南方最佳诗评人奖”，比如他关于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的评论，就以多重维度间形成的矛盾张力揭示了长诗新的内涵，以强有力的难度进入强有力的作品文本，并构成有效对话，显示了庆祥出色的诗心思力、独有的干练有力而冷静稳健的文风，以及独特纯正的审美原则和历史洞察力。

他的成名作《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以第二名的高票获得了本刊“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有论者曾著文说，庆祥和上海一著名批评家同票，“在僵持中，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说：庆祥此文深得我心。最终，杨庆祥成为该奖项历年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以讹传讹了，庆祥确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但持续了13年的《南方文坛》年度奖，一直由编辑部初选若干篇目，提交评委独立审读终评并写出简短评语，以邮寄（包括电邮）投票方式评出6篇获奖论文，并以得票多少排序。同票，取年轻作者。评委敬泽兄在投庆祥文章票时，的确有“深得我心”之真言，高票的庆祥不存在僵持之说。同票事件，是指2010年度评奖时，庆祥师妹杨晓帆与著名评论家同票，编

辑部取年轻的晓帆。这也是本刊催生新一代批评家成长的旨归。于是，“庆祥有了第一次坐飞机的机会”（程光炜在2013年5月“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如是说），我也幸运地多了个得力助手。

2010年阳光灿烂的初夏，我因参加《现代中文学刊》的学术会议，在虹桥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黄平，他一声愉悦的轻呼和一脸的天真，让我疲劳顿消，没料到为《南方文坛》主持过两年新时期文学“作家访谈”专栏、写就一手雄辩文章的黄平，竟是如此阳光少年，而且接人待物，既有东北汉子的自然爽朗，也有南方人的细致周详。难怪陈子善先生不仅请他做兼职编辑，还要为他介绍女朋友。在《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黄平”专辑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以书信的方式评述与褒奖后学黄平，亦师亦友，算是学界佳话。

以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出发，黄平比较集中于八十年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80后”文学与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研究。令他分别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奖的《“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等佳文，令我们感受到他进行着一种通过“形势分析”抵达“历史分析”的尝试，他认为有效的批评，是以文学分析方式真切阐释“中国故事”。从路遥、贾平凹，到韩寒、郭敬明；从《今天》，到王朔、王小波、六六，乃至网络文学，他在做着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关联可能性的努力，尤其是打通自己的“专业”与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包括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及上海进行深度的学术对话，例如他的《〈蜗居〉、新人与中国梦》，以及新近发在《南方文坛》

的《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便显示了他这种独特的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并寓同情理解于审度中。这种深入时代与生活的学术姿态，也许与黄平丝丝入扣的文本细读有关，与他声情并茂的滔滔雄辩有关，与他课堂上爆棚的人气有关，或许还与他热爱生活有关，与他身上的人间烟火和厨艺有关，也许也许……“小小少年”不仅有了真正的学人功力，还有高于同龄人的生活能力，令人欢喜。我素来认为精学问、能工作、会生活、有才情是人生高妙之境，尤其对于知识女性，而辽宁青年黄平却也能抵达，实属不易。

如果说庆祥的通达令我亲切，黄平的朗健给人阳光的话，金理的沉实则让人心静。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11月我们同行越南，颁完年度奖后评委与获奖者且行且聊，会心之下，颇为开心。而两位年轻的获奖者——在读博士金理与杨晓帆，金童玉女，虽一静一动，却也谦谦然，颇为养眼。也有豪迈的评委大家对金理时时的静默和拘谨有所质疑。但分别不久，我便收到金理的来信，方知金理心中之痛。两个月前，他刚痛失父亲。他痛自己对父亲突发重症一无所知，“等我赶到病床前，陪了不到十分钟，我父亲就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自此父子分别……父亲17岁的时候离开上海去江西插队，最后就是我和母亲扶着他的灵柩回沪，辛苦一生就这样走了，天地不仁”；他痛自己求学的时间太长，父亲退休还没返沪，自己“至今还没工作，连孝敬父亲的机会都没有”；他痛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不幸临身，“才发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抵御这种伤痛，真的一无可恃”。他感谢《南方文坛》“给了我机会和生活世界恢复基本的关联，能态度积极一点带着母亲走出阴影”。长叹中，我立即电告那有些误解的大家，金理是因家有大事而略显缄默。两年后，我有幸见到金妈妈和他的新娘，已是

蔼蔼然充满爱心暖意的日常生活，欣然中，便以为寻到金理明亮双眼深处的光源，找到他沉静笃实文字的根须了。

三人中，出道最早的是金理；大三时，他的处女作《繁复的表意空间》，就经老师张新颖推荐发表在《上海文学》2002年第12期。之后，他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在《小说评论》开“小说的面影”专栏等。我一直欣赏金理从小处为切口，并渐次撕开扩大的入笔方式。对于性灵笔慧并潜心研习的金理，新颖君曾向我描述过“老师与学生共处而长成”的感受，令我感动并羡慕金理有福，前有才情兼备的张新颖师指引，后有一代大家陈思和师相携，难怪金理能在闹中自静，沉潜研习。也是新颖兄推荐并主笔，2008年第6期《南方文坛》做了“今日批评家·金理”专辑，近十年，金理以不断的文章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2013年，还在《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的年度青年峰会上，独获“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我草拟的授奖词如下：

金理以丰富的学养、通达雅正的文风以及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翘楚于“80后”批评家群落。2012年度，他对现代文脉的接续，对当代文学的时代冲突和精神困顿，对“80后”写作的变局，都有深度的思考和洞见。他的人文阐释精细条理，学术感觉敏锐，论述清通畅达；他以专注的目光、个性的发现、独立的专业精神，显示了青年批评家开阔明晰的学术视野与独特沉实的学术潜力。

近年，再见金理，沉静依然，却时有歌声低低传来。是的，到复

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追求沟通文史哲、现代与当下，行文有出处的严谨金理，走过了冬日，虽还慢条斯理，却已踏歌而行了，真好！

全媒时代，批评何为？浮躁喧嚣中，三人相携，竟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共同追求着一种具有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批评；而且，深入文学现场，都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三人同曲共鸣，彼此欣赏，当下文坛，真的是难得几回闻。便想，正是春风得意时，三才俊是否对褒奖有足够的警觉？是否对漂浮的欲望和诱惑有足够的守持？是否对名利的加减与进退有足够的明察？是否对“志业”有足够的沉静和耐心？古人说“辨材须得七年期”，人与树的成长亦然，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想起庆祥“三人谈·发栏词”的自白：我们和前辈一样，都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或者说不过是一座“桥”，来路茫茫，去路滔滔。对我们来说，文学既是起源也是终结：它是我们赖以理解时代、历史和自我最合适的支撑点，最终也是我们个体生命得以丰富展开的形式。

如此看来，我的忧虑只能算共勉了，因为他们有“历史中间物”的理性自觉，便会在文学之路清醒而坚实地行走。记下这些文字，不仅是不辜负三位才俊的信任，也是一种以他们为师为友的学习机会，一种对三人行的致敬和祝福。

是为序。

2014年春分

目 录

1	以文学为志业
31	“80后”写作与“中国梦”
60	什么是“80后”文学
93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想象和书写
116	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144	反思社会主义文学
172	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下性
193	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谈杨庆祥的文学批评 / 孙郁
207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致黄平 / 倪文尖
218	见证一个人的成长 / 张新颖
222	致谢

以文学为志业

金：“三人谈”的第一篇，从自身谈起。首先，我们三个其实是在一个文学风光不再的年代里遭遇文学的，为何“初恋”延续至今？我们的身上，其实袒露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接受文学教育以来）前辈研究者们对文学的不同想象方式，以及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思潮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对此，我们有何种欣慰、困惑、不满、反思……其次，在整理好自身历史与思路后，我们还需要回答的是：今天我们介入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姿态、追求与意义。这些内容，类似于清理好自身知识积累与立场之后的“再出发”。前者是“回首来时路”；后者是“我们往何处去”。

一、我们如何遭遇“文学”

杨：金理建议从我们如何遭遇“文学”谈起，这让我颇是犹豫了一番。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私人化的经验，说不好就成了某种自恋式的回忆；另一方面，这些私人化的经验又很是零散错乱，不知道如何“言说”。黄平在来信中提到可以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病”来看待，这倒是一个极妙的视角，也让我觉得有话可

说。这里先谢谢黄平的提醒。

说来很有意思，我与文学最初的遭遇，确实是与“病”有关的。据我父亲的讲述，我出生时不会哭泣，当时农村医疗水平很差，几个赤脚医生手忙脚乱抢救了很长时间，一位查姓医生几次建议我父亲放弃抢救，但我父亲脾气倔强，不愿轻易放弃。其时正值春节，恰好我的一位亲戚——她是南京军区第八一医院一位很有声望的医生——探亲在家，我父亲急忙把她请来，在她正确地指导下，我终于在出生十几个小时后发出了啼哭。这位亲戚告诉我父亲，虽然孩子活下来了，但是这么长的抢救时间，可能会对智力和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他注意对我的教育。父亲谨记此言，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似乎还没有多少开发智力的方式，而父亲又正好是一个接受过师范教育的文学爱好者，于是，文学成了首选形式。

最开始是从背诵唐诗宋词开始的，每有亲戚到家，父亲要求不给我带任何礼物，而是教会我背诵一首诗词。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我已经能背诵不少的篇目，间或去父亲的单位，他的同事们喜欢让我背诵一首首诗词给他们听，然后给我几颗糖作为奖励。那时并不认识字，记忆完全凭借语音，这些没有形状的字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各种形式的颜色和气味，这或许是对想象力最初的锻炼吧。我大概从十一岁开始学习写诗，也是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

稍微大一些，我开始看更大部头的小说，比如《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说岳全传》（《红楼梦》等到大学时候才开始读）等，与诗词相比，这些作品的故事更能吸引我。夏天

的晚上，我和父亲在湖边纳凉，他会让我讲一段这些小说给他听，往往是在我眉飞色舞的“说书”中，他就已经睡着了。这些与文学最初的遭遇，实际上是充满了快乐的。以后就上高中，上大学中文系，阅读开始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专业，但如果非要说与文学的遭遇，我的记忆却还是定格在那种“原初”的懵懂中。

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的孩子大概也会接受这样的教育，而且肯定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系统和科学。但是那种阅读的快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吧？个体与文学的遭遇都是“历史性”的，不可重复，甚至不可沟通，如果没有这些遭遇，也许文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冷冰冰的词语，而不像现在，充满了温度和纹理。

黄：谢谢庆祥，也谢谢金理兄设计的好题目。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对于如何遭遇“文学”的讨论，或是“三人谈”后续的更偏向作品、历史或理论的讨论，更接近于“病”而不是“药”。从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前辈“三人谈”以来，近三十年来有各种各样的“三人谈”，以“对话”这种方式，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等前辈在当年尽管彼此年龄有十五年上下的差异，但基本分享着类似的知识立场与观点，可以用如“20世纪中国文学”等要点加以概括。比较而言，我们的“对话”，虽然年龄上没有差异（庆祥是1980年出生，金理和我是1981年），但无论文学资源、知识构成或是价值倾向，都有明显的不同。和“80年代”相比，当下的文学场域（其实又

何止文学场域），“共识”早已破产了。任何一种观点，无论左、中、右，都无法完全有效地整理当下杂多且断裂的中国经验与文学经验。因此，和“开药方”相比，我把自己的观点与经验指认为“病”，讨论“以文学为志业”，是对自我的一种“症候性读法”。毕竟，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历史化”，一定是指向自己的。我们来自安徽、辽宁、上海，成长于乡村、城镇、都市，在文学阅读与教育阶段遭遇不同的文学传统与知识谱系，坦诚地表征自我，剖析“病理”，为未来留下一份“病例报告”，或许更有价值。

回到我自己的“遭遇”上来，作为“计划生育”的一代，我是家中独子，从出生开始就享受着全家——从姥姥、姥爷到父母、姨妈等——近乎夸张的溺爱。家人一直不鼓励我出门玩，安静地一个人读书，成为我识字以来到今天的常态。可能每个孩子家里都有一个秘密书柜，我把家里能找到的书（并不多，谈得上名著的极少）都翻烂了，从残缺到只有第一册（记得那个版本共有十册）的《天龙八部》开始，我开始去租书的地方补齐其余的九册。那时候我正在读初中，在县城影剧院旁边的租书店，读完了所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多不止一遍。

初三中考结束的暑假，算是转折点，我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图书馆。那是1996年的夏天，由于“国企改革”，东北整体的颓势很明显了。县图书馆读者寥寥，新书也没有几本，但是馆藏的“经典名著”之类，对于一个中学生足够了。我借的第一本书是《呐喊》，借的第一本西方名著是《基督山伯爵》，从高中同学那里（高一这个阶段的同学开始谈论“文学”了）借的第一本

书是《简·爱》。无论是中学语文制度的教习，还是“阴谋”与“爱情”这类近似大众文化的主题，构成了我对于“文学”最初的体验。

作为一个在县城长大的文学青年，我向一套文学丛书致以敬意：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名著普及本（全译本）”。小三十二开，小号字，简单的装帧，以及最重要的便宜的价格。这套丛书从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大致以19世纪欧美俄苏的经典为主，封底的目录成为我当时的购书指南，一本本地在小城不多的几家小书店凑齐。书架上的“名著”渐渐多起来，《雾都孤儿》《双城记》《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前夜/父与子》《茶花女》《嘉莉妹妹》《悲惨世界》《在人间》……此外，借助图书馆，我开始一本本地借阅《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复活》《大卫·科波菲尔》《高老头》《俊友》《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作品，以及契诃夫、欧·亨利、马克·吐温、屠格涅夫等世界经典中短篇小说选本。慢慢地，我遇到了自己感到最投缘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从《远大前程》开始，我几乎读完了所有能找到的狄更斯作品。另一位热爱的作家是鲁迅，我在中学阶段差不多读完了鲁迅和狄更斯的全集。对于鲁迅先生，我尤爱杂文与《故事新编》，高中学习之余读几篇，是最好的调剂。

县城的时间总是慢的，我几乎没读过20世纪的经典，比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等等，唯一读过的是卡夫卡《变形记》，但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有些细节——比如甲虫背部腐烂的苹果——写得传神，这还是19世纪的“眼光”，到今天也没